

中国思想史

导论 思想史的写法

葛兆光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中国思想史

导论

思想史的写法

葛兆光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导论》上下，原来分别放置在第一卷与第二卷前面，题为《思想史的写法》和《续思想史的写法》，目的是交代和说明研究角度、资料取舍、写作思路，现在重印，把它们合在一卷，统称《导论：思想史的写法》。

用“写法”为题，并不是说这里讨论的只是一种写作策略，因为思想史的不同写法背后，总是有不同的观念、思路和方法，写法的改变常常意味着思想史研究的观念、思路和方法的改变。这里讨论的就是一些关于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理论和方法问题，比如思想史应当如何思考精英与经典的思想世界和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知识史与思想史之间应当如何互相说明，古代中国思想的终极依据或者说基本预设是什么；思想史应当如何改变过去的传统写法和充满训导性的教科书式的章节结构，以追寻思想史的真正脉络和精神；思想史是否应当描述所谓“无思想”的时代，在无画处看出画来；作为历史记忆的传统知识和思想如何在重新诠释中成为新的思想资源，又因此而产生了思想史连续性；思想史研究中如何看待和使用考古发现与文物资料等等，最后，《导论》也讨论了在后现代历史学理论渐渐进入中国的背景下，应当怎样理解和限制这种理论资源的意义和边界。

葛兆光 清华大学教授。

1950年生于上海。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班。

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禅宗与中国文化》、《道教与中国文化》、《汉字的魔方》、《想象力的世界》、《中国经典十种》、《中国禅思想史》等。

专家荐书

李学勤：《中国思想史》虽然也写了精英和经典的思想史，但作者用浓彩描绘的，则是“一般思想史”。这就使得这部书，不仅在方法上、而且在视野上，也具有着全新的面貌……它以崭新的角度和层面展示给人们的，是大家不那么熟悉的思想世界，更广泛、更深入地体现出研究的新意。

邢贲思：有很多部很有价值的作品是由中青年学者主编或独立完成的，说明我们的人文科学研究后继有人。比如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参考了大量文献，资料翔实，视角独特，观点新颖，研究扎实，十分难能可贵。我想，在鼓励原创的基础上，应该对独立完成的优秀著作给予特别的关注。

王元化：葛兆光的这部思想史掌握的资料相当丰富。我们的思想史、学术史的撰写是非常贫乏的，过去也有人谈到重写文学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新写的文学史或思想史都可以称为“重写”……我想今天会上所说的“重写”，大概是指这部思想史在思想观念上要建立一种和过去不同的方法、观念和系统，要有一些新的发展或突破。

朱维铮：这部书的特色在于它有总体性的思考，又有不少精辟的具体见解。学术史表明，有的时候，有人忽然闯进一个陌生的领域，倒是会发现一些那个领域呆了很久的人没有发现的问题。我读兆光这部书，便常有这样的感觉。

兆光是位认真的学者，在学风上很严谨。他的这部思想史，我认为他取得了几点前人不具备的成就。即使书中若干可议的部分，我也很佩服他花了那么大的力气去探讨。

葛剑雄：原来我们讲的思想史太窄，葛兆光现在把思想史拓宽了，至少已经拓宽到他所讲的信仰、知识结构。有人说这种写法外国早就有，我说他是创新，学术评价要鼓励这样的创新。不是说吸取了国际上的成果，或是受了什么启发，就不算创新。至少到目前为止，在中国有没有人系统的贯彻这样的思想，来写思想史，那应该说还没有。那么这一点就很了不起。

周振鹤：葛著《思想史》的基本意义即是让我们知道原来思想史也可以这样写法，也可以这样研究……将思想做成历史的历史并不长，已出版的中国思想史的数量并不多，另写与再写的空间还很大。我想葛著的主要学术意义即在此，而不在于像某些人那样，以为自己的著作已达到“一书行而百书废”的水平。而且，即使是如同葛著的这种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史也有被再写的可能，这才是学术发展的正常道路。

目 录

导 论(上)	1
引 言 思想史的写作	2
第一节 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历史	9
关于中国思想史叙述与解释的习 惯——对“经典话语系统”中的思 想史写法的三个疑问——一般知 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思想 史的基盘或底线：长时段——文 献资料范围的拓展与使用方法 ——重写思想史的前景与困境	
第二节 知识史与思想史	25
学术与思想：近年来学界的一个争 论话题——思想史的知识源头与 背景：以数术史与经学史为例 ——知识的变动与思想的变动之 间——知识影响思想的一些历史 例证——对历史的体验和理解 ——关于这一想法的来历	
第三节 “道”或“终极依据”	39
科林伍德的比喻和马王堆帛画的 联想——探寻知识、思想和信仰	

的历史源头处——天经地义：天不变道亦不变——天人合一：不仅仅是环境保护或亲近自然的口号——天崩地裂：终极依据的坍塌以及思想史的变局——处处碰着它：朱熹直觉中领悟到的终极依据

第四节 连续性：思路、章节及其他 51

思想史、《思想史》以及《思想史》的三种写法——历史的连续性与福科的疑问——连续性追寻的三种思路——教科书模式与章节的割裂——思想史连续性的三种类型——对一个思想命题的不断解释——脱魅或理性的排斥，断裂中的连续——对外来思想的回应中重新发掘和解释思想传统中的资源——个人性写作与重写思想史的想法

导 论(下) 67

续思想史的写法 68

至今思想史仍难以把握：中心清楚而叙述的边界模糊——与宗教史、学术史、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之间的关系——哲学史与思想史——目前我思考的几个问题——一切尚无明确的答案

第一节 无画处皆是画 71

思想史为何不愿意叙述平庸的时

代?叙述的形式、观念和心情——“空白”的背后,其实写满了未发表的文字——传统的思想史写法——思想史不是点鬼簿和光荣榜——盛唐缺席的例子——思想史:究竟是思想还是历史——思想的平庸时代是否具有被思想史书写的意义——平庸背后有深刻的内容:洞察力和批评力的消失——盛唐、明代、清代到文革时代的几个例子——两种历史时间——可以在“空白”处描述出思想史的三种情况——需要对过去思想史不常涉及的畛域和文献进行打捞和爬梳,更要用另一种观察历史的立场、视角和眼光

第二节 历史记忆、思想资源与重新诠释 …………… 84

“影响”:思想史家无意中凸显了“施与”却忽略了“接受”——思想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固有的思想资源不断地被历史记忆唤起,并在新的生活环境中被重新诠释,以及在重新诠释时的再度重构——翻译与转化:回应外来新知时的本土思想资源——历史记忆压抑的几种方式——圆熟时代历史经常被遗忘,直到面临危机时才重新发掘——历史记忆大致有两种不同取向——回溯本原,以向回看的方式进行文化认

同——斩草除根,以发掘历史记忆的方式来反省自身传统——文化的保守与激进:两种取向的纠缠——协调两种不同研究思路的冲突——外在因素与内在理路之间——旧中有新、新中有旧——朱熹的比喻——从张大春《将军碑》说到历史记忆

第三节 思想史视野中的考古与文物 99

从甲骨文、敦煌文书、流沙坠简说到最近的考古发现——考古发现的意义:古书的再发现、走出疑古思潮的笼罩以及其他——思想史写法的变化扩大了考古发现在思想史中的使用——注重知识背景的考掘和一般思想的叙述——碑刻、书画、信札、日记、公文、书籍等等也可以作为分析文本进入思想史的视野——两类例子:小类书、私塾教材、考卷等,以及《日书》与《皇历》——图形的考古与文物资料如何进入思想史的研究视野?——空间、时间以及观念——以作为思想史资料的世界地图为例——开放边界与确定边界:思想史家们应当如何充分地应用这些考古与文物并把它恰如其分地安置在思想史的写作中

第四节 从“六经皆史”到“史皆文也”：作为思想史 研究资源的后现代历史学 …………… 115

《怀柔远人》的争论与199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历史只是语言的叙述？“六经皆史”到“史皆文也”——真实、真实、真实：前百年的历史学追求——海登·怀特的观点——“叙述”一词中历史与文学的界限的消失——凸显与遮蔽：以思想史叙述中的王通与周敦颐为例——在书写与叙述中区分真伪的意义何在？对过去中国历史学中一个原则的重新考虑——发掘各种真伪“叙述”背后的支持观念系统及其历时性变化——在历史书写中进行知识与思想的考古发掘：虚构的故事、选择故事的意图、记载的标准、包裹的思想——权力与叙述：写法中的思想史——詹京斯关于历史书写中的“权力”的论述——顾颉刚与古史辨：“层层积累的伪史”说——疑古思想中的现代性：与后现代历史性思想的差异——历史学是否能够确立一个最后的限度？

中国思想史 导论

思想史的写法

上



引言 思想史的写作

科林伍德(R. G. Collingwood)把思想史看作唯一的历史,这一说法曾经受到重视,也曾经招致批评,不过,如果我们把它理解成只有思想的历史的传统仍在今天延续,我们也许会对这种不免过分的说法表示同情。什么是历史?如果说,历史就是曾经在过去的时空中出现过的人、物与事,那么它确实已经随着过去的时间的消失而消失了,过去的铁马金戈早已是断戟残矢,往日的辉煌气象已经只剩下萧瑟秋风,东窗下也罢,萧墙内也罢,尽管有种种阴谋阳谋,如今也只留下几页几行的痕迹,千夫指,万民伞,尽管有贤愚忠奸不同,现在也只成就了几出戏文、几个故事。它们在博物馆里,在考古遗址中,在古代文献里,在历史教科书中,向我们叙说着过去,我们可以聆听和阅读,也可以转身走开,这种“历史”并不纠缠“当下”。可是,真正绵延至今而且时时影响着今天的生活的,在我看来至少还有两种东西:一是几千年来不断增长的知识和技术,前人的智慧和辛劳积攒了许多生活的知识和技术,使后人得以现成享用,也使后来的人们可以把前人的终点当起点,正是在这里,历史不断向前延续;一是几千年来反复思索的问题以及由此形成的观念,多少代人苦苦追寻的宇宙和人生的意义,多少代人费尽心思寻找的有关宇宙、社会、人生问题的观念和方法,影响着今天的思路,使今天的人依然常常沿着这些思路思索这些难解的问题,正是在这里,历史不断地重叠着历史。如果说前者属于技术史,那么后者就只能属于思想史。思想没有随着有形的器物、有限的生命一道消失,通过语言文字、通过耳濡目染、通过学校内的教育和学校外的熏染,一代

真正绵延至今而且影响今天生活的是不断增长的知识和技术,以及反复思索的问题及由此形成的观念

一代地在时间中延续下来,由于这种“延续”,今人还可以重温古人的思索,古人的思索对于今人还存有意义,科林伍德说:“历史的知识是关于心灵在过去曾经做过什么的知识,同时它也是在重做这件事,过去的永存性就活动在现在之中”^①,思考的问题和思索的方式,解释的话语和实现的途径,一代又一代地重复、变化、循环、更新,有了时间和空间的连续,于是就有了历史。

写作思想史因此而有其意义。不过,回顾现代学术史却可以发现,在近代中国,思想史这一名称似乎没有哲学史这一名称受青睐,也许,三分之一是因为西洋的“哲学史”的现成范式给予转型期中国学术的方便,三分之一是因为“哲学”一词的西洋意味在二十世纪前半期对中国学术的诱惑和挑战,还有三分之一是由于大学学科的划分中有哲学一系,因而需要有相应的教材^②。于是,有的学者试图挪用西洋成型的概念、术语和逻辑总结中国的学术历程,而有的学者则试图在中国的学术历程中找到与西洋一样的哲学以证明中国也有同样的知识,还有的学者则为了大学的教学而写作哲学史教材。所以,翻开二十世纪的学术著作目录,以“思想史”为名的著作似乎还没有以“哲学史”命名的著作多,而且也不像哲学史的撰述,曾经经历过相当完整的过程,积累过相当成熟的经验。

可以简单地回顾一下哲学史的撰述历史:一九一六年,那个特别手快而且特别善于抢先占领选题的谢无量就写过六卷

二十世纪的
中国,以
思想史为
名的著作
没有以哲
学史命名
的著作多

① R·G·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中译本,247页,何兆武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6。

② 当然,“思想史”这一名称的确立也比较晚,吉尔伯特(Felix Gilbert)在《思想史之目标与方法》中曾经说到,在西方,晚至1939年,“思想史尚未成为一个普遍的用语,学术界是渐渐地在不知不觉中才采用了这个语词的”,载《当代史学研究》(Historical Studies Today, Edited by Felix Gilbert and S. R. Graubard),李丰斌中译本111页,明文书局,台北,1982。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与任继愈《中国哲学史》以及八十年代的《中国哲学史新编》

一册的《中国哲学史》，不过他的著作常常只有一个新式的名称和一堆粗加选择的资料，它的叙述并不具备范式的意义^①，所以当三年以后的1919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之后，一下子就被取而代之，后来，胡适自己说，“中国治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仿佛谢无量的书压根儿就没有存在过似的。不过，尽管蔡元培说了胡适此书有四大特长，即“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②，但是，它毕竟写来匆匆，半截而止，当受过更系统哲学史训练的冯友兰于1930年、1933年相继写出完整的《中国哲学史》之后，胡适的《大纲》就又被取代，当然胡适的《大纲》并不是过眼烟云，他的研究至今仍有意义和启发，但是，这意义与启发更多的并不是哲学史本身而是有关学术史一个新范型的生成、过渡与消失的话题，因为它的“示范”意义要大于“说明”意义。冯著系统而且完整，对于西洋哲学的概念、思路有较深的认识，对于中国古代思想与学说有“了解之同情”，分量也适合一般读者，所以当它在清华大学作为讲义印发时，就受到相当的好评^③，而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之后，更风行一时。可是，随着时势变迁，冯友兰的哲学史也曾被湮沉有年，六十年代以后，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以更加简单清晰的线索和逻辑，以更加意识形态意味的解释方式，以更加明白易懂的语言风格，又取代了它^④。直到八十年代，意识形态的强制性渐渐淡化之后，冯著又一次由中华书局出版，并在此后由中国最重要的人民出版社推出他的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历史仿佛兜了一个圈子，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不过，经过这近八十年的历史，哲学史大概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足

① 谢无量《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上海，1916。

② 《中国哲学史大纲·序》，商务印书馆，上海，1919。

③ 参看陈寅恪、金岳霖的审查报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后附，中华书局，北京，1993年重印本。

④ 任继愈《中国哲学史》四卷本，人民出版社，北京，1966。

以使它可以在“重写”的时候取资参照。

但这里还是有一个问题。毫无疑问,哲学史的撰述,不仅有相当多的撰述经验,而且从一开始就有一个现成而明确的范式可以使用,正如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的一开头所说,“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①,他按照西方的哲学概念,指出现代意义上的哲学史包括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的发展历史,所以哲学史的写作者对他们要描述的历史是很清楚的。但是,很久以来我一直有一个很顽固的观念,我觉得用哲学史(History of Philosophy)来描述“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如果不对西洋的哲学概念加以修改,严格沿用西洋哲学现成术语的内涵外延,多少会有些削足适履,如果不对中国的思想与知识进行一些误读和曲解,多少会有些圆枘方凿,所以,中国古代的知识和思想是否能够被“哲学史”描述,实在很成问题^②。唐君毅在《略论作中国哲学史应持之态度及其分期》中曾经说过,“哲学

中国古代的知识和思想是否能够被“哲学史”描述,实在很成问题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1页。

② 其实这种怀疑很早就有,比如当年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设想的“道术史的做法”,可能就是不太想用“哲学”的名称,而想代之以中国式的“道术”,而金岳霖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就已经对此问题有一些怀疑的态度,他说,“如果一种思想的实质与形式都异于普遍哲学,那种思想是否是一种哲学,颇是一问题……‘中国哲学’这名称,就有这个困难问题”,他没有把他的疑问进一步说出来,见冯著《中国哲学史》后附《审查报告二》,5页。傅斯年在《与顾颉刚论古史书》第三《在周汉方术家的世界中几个趋向》中也明确表示“我不赞成(胡)适之先生把记载老子、孔子、墨子等等之书呼作哲学史,中国本没有所谓哲学,多谢上帝,给我们民族这么一个健康的习惯……大凡用新名词称旧物事,物质的东西是可以的,因为相同,人文上的物事是每每不可以的,因为多是似同而异”,见《傅斯年选集》第三册,423页,台北,文星书店,1967。近年陈启云在《两汉思想文化史的宏观意义》中则指出,就连冯著《中国哲学史》也实际上“名为哲学史,其实只是由一位哲学家本其哲学素养而写成的思想史”,载《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下册,59页,中华书局,1995。

之名,本中土所未有,如昔所谓道术、理学、心学、玄学之名,与西方所谓哲学意义皆不相同”^①,其实何止名称,没有哲学这种名称,意味着中国人也没有恰合哲学这一名称的意义的知识、思想与学术,但在西方学术话语笼罩的时代,就是唐君毅,也没有把他的立场坚持下来,在约定俗成中他后来仍以“中国哲学”统摄古代的思想与学术。相比起来,“思想史”(History of Thought 或 intellectual history)在描述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学问时更显得从容和适当,因为“思想”这个词语比“哲学”富有包孕性质。

当然,也有一个看来相反实则同样的问题,使思想史也面临尴尬。正是由于这种包孕性,有时使得“思想”成了漫无边际的一个名词,而“思想史”也因此承担了过分沉重和庞大的责任,以至于连自己的范围和内容也搅得不清不楚^②。所以,在哲学史被人们反复写来写去的八十年中,以“思想史”为名的只有寥寥几部^③,就是算上前面有了限制定语“政治思想史”、“宗教思想史”、“学术思想史”和断代的几部思想史,也不能与哲学史相比^④,而且就在这为数不多的思想史著作中,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就几乎笼罩了半个世纪。

① 唐君毅《略论作中国哲学史应持之态度及其分期》(1940)、《中国哲学研究之一新方向》(1965),见《中国思想史方法论文集》109页、123页,台北,大林出版社,1981。

② 至于讨论思想史编纂的体例和对象的论文,数量也不多,大概最要紧的是蔡尚思《中国思想史研究法》和陈中凡为它所作的序文。《中国思想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上海,1939;陈序又收于《陈中凡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③ 据《八十年来史学书目(1900—1980)》的统计,除了侯著之外,还有常乃德的《中国思想小史》(1938)、钱穆的《中国思想史》(1952)、杨荣国的《简明中国思想史》(1962)、韦政通的《中国思想史》(1979)、侯外庐的《中国思想史纲》(1980、1981)、何兆武的《中国思想发展史》(1980)、褚柏思的《中国思想史话》(1980),当然,这个统计并不完备。

④ 《古史辨》第四册罗根泽的《序》中称,他“最后的目的是写一部详赡而有系统的学术思想史”,但他最终也没有写出来。

在这里我不想对侯外庐主编的这部思想史进行评价,因为这会占用相当多的篇幅,无论如何,这是一部规模宏大、内容丰富、线索复杂而且文献翔实的著作,要对它进行细致的分析必须极其认真。在这里我只想说一说,在撰写我自己这部《中国思想史》时阅读它的一点感想和一点思索,并作为我们进一步讨论的起点。1947年,当《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出版时,侯外庐曾经代表中国学术研究所写了一篇序言,在这篇语词很华丽的序言中他说,“斯书更特重各时代学人的逻辑方法之研究,以期追踪着他们的理性运行的轨迹,发现他们的学术具体的道路,更由他们剪裁或修补所依据的思想方法,寻求他们的社会意识以及世界认识”^①,在这里,可以看出他们对于思想史的对象的认识是“逻辑方法”、“学术道路”、“社会意识”和“世界认识”,仿佛还算明白。1957年,修订过的《中国思想通史》出版,不知为什么撤去了1947年版的序,而由侯氏另写了一篇措辞简要的序,但是序中说:“这部《中国思想通史》是综合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在一起编著的,所涉及的范围显得比较广泛,它论述的内容,由于着重了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说明,又显得比较复杂”^②,在这里,思想史的思路反而有些混乱,“思想史”的内容既包括了“哲学”、“逻辑”和“社会思想”,又包括了“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在这些词语内涵外延都不够清楚的表述中,我们似乎看到了思想史的困境,除了可以理解的当时的情景之外,思想史与哲学史、意识形态史、逻辑学说史等等的界分不明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应该追问:思想史真的是可以包容哲学、意识形态、逻辑学说乃至政治、法律、科学的一个“大历史”吗?如果是这样,那么科林伍德所说的一切历史都只是思想史就真的成立了,但是,又有谁能写出这样包罗万象的思想史呢?

思想史真的是可以包容哲学、意识形态、逻辑学说乃至政治、法律、科学的一个“大历史”吗?

① 《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古代思想编》卷首,新知书店,上海,1947。

② 《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古代思想》,人民出版社,1957。